

巴金的藏书与捐书

周立民

1949年初春,战争的阴影笼罩着上海,一个政权的统治面临崩溃,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然而,作家巴金似乎逛书店逛得更勤了。他当时住在霞飞坊59号,那里的楼梯是木质的。买了书回来的巴金,踩着楼梯往上走时,脚步尤其沉重。听到这很有特色的声音,全家人都知道是巴金回来了。黄裳这样描述巴金的住所:“霞飞坊的房子开间不大,三楼临窗放着一只书桌,铁床放在后侧的角落里,其余的空隙全部被装玻璃橱窗的书架占去。书架布置得曲曲折折,中间留有可以侧身走过的通路,就像苏州花园石假山中间的小径似的。书架里绝大部分是外文书。”(黄裳《记巴金》《黄裳文集》)尽管人已经睡在了书架中间,可是,每有新的收获,巴金还是兴致盎然。那些精美的、大部头的洋装书,仍然源源不断地涌进家中。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别人忙着逃命,巴金却在抢书,十足书痴。写书,编书,出书,巴金的一生都是围着书转。他从未想到要做藏书家,或许因此藏书家巴金的光芒被大大掩盖了。在现代作家中,郑振铎、阿英、唐弢、叶灵凤、宋春舫、黄裳都是声名显赫的藏书家,其实,巴金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在西文图书、新文学作品收藏上,无论数量和特色,能够与巴金比肩的藏书家寥寥无几。

到过巴金故居的人,无不惊叹:这里简直是书的世界。无论是主楼、附楼,还是汽车间,凡是有空间的地方都为书所占。巴金寓所中原有书橱(书架)80多个,为了方便观众参观,过道处抽出了不少书架,目前布置在各区域中的书橱(书架)还有37个。巴金故居现在收藏的书刊有近4万册,这是巴金捐赠给各图书馆后的遗存。巴金的藏书数量目前还没有精确的统计,依据资料汇总,巴金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的书刊共7000多册、中国现代文学馆9000多册、上海图书

馆6395册、泉州黎明大学7073册、南京师大附中600多册、香港中文大学71种1202册(以线装书为主),另外给成都慧园等机构也捐赠过图书。如此算来,巴金的藏书总有六七万册之多。

巴金的藏书,古今中外,种类繁多。作为中国新文学作家中的一员,对于新文学藏书,巴金力求齐全。他的西文藏书更是种类多、语种多、版本全、珍本多。仅就文学作品而言,巴金喜欢的作家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赫尔岑、但丁等不同时期不同版本所见俱收,插图本、限定本等豪华版本也很多。如《神曲》就有1888年版的汇注本,1921年版的袖珍精装本,圣彼得堡印的俄文旧版本,还有法文的、英文的译本等。无政府主义理论、人物传记、报刊和其他史料,这些书刊因为条件所限,常常发行量不大,尤为珍稀。

这些书,大多数是巴金一本本从新旧书店中挑选、购买、订购的。多年来,巴金都过着简朴的生活,他的收入都来自他的稿费,然而,逛书店、买书是他一生保持的仅有的业余爱好之一。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东京的神田旧书店,北京的东安市场,上海常熟路的西文旧书店、福州路的外文书店等等,都曾留下巴金流连书肆的身影。

塞纳河畔一带的旧书摊是巴金常到的地方。“一个星期中我至少要去两次,每次回来,两只手总是满满的。”(《骷髅的跳舞》译者序)《巴金全集》第17卷第13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有一次,在绵绵的春雨中,巴金花了两个半法郎买回一本日本作家秋田雨雀的《骷髅的跳舞》,这是一本世界语小书,几天后,他在游人不多的卢森堡公园安静地读完它,几年后他把它翻译成中文。对巴金的写作有着很深影响的俄国作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也是巴金在旅法期间读到的。“《往事与随想》可以说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谈它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五日,那天我刚从美

到英国康·加尔纳特夫人(Mrs.C.Garnett)翻译的英文本。当时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还没有写成。”(《往事与随想》后记(一))。《巴金全集》第17卷第292页)巴金并未留下那时的日记,这个日期在近半个世纪后还能记得如此清楚,是因为他在书的扉页上,用钢笔写着自己的英文签名和这个日期。这本书至今仍保存在巴金故居,虽然墨迹已经变淡,然而,两位伟大作家的“相遇”却留下珍贵的实物见证。

1934年,巴金来到日本,先是住在横滨,1935年春,到了东京,那是购书的天堂,更何况巴金就住在神保町附近:

“中华青年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关于〈神·鬼·人〉》,《巴金全集》第20卷第6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1935年初,巴金在日本写下的《书》一文,记录了他当年买书的心情: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了森鸥外,岛崎藤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圆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了。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书》,《巴金全集》第12卷第467-4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

巴金的藏书中,有不少贴着神保町旧书店标签的书,想必大多都是他当年逛书店的“战果”。就这么“两手总是满满的”,总是“心里还颇高兴”,就这么日积月累,家里还不是满坑满谷的书?

(作者系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

提示 11月25日是巴金的诞辰,114年前,巴金出生于成都府城北门正通顺街的一处老宅子里。巴金喜欢藏书,他收藏的中文书刊有大量的现代文学珍品,也讲究收藏外文书刊,可以说是民间私人收藏外文书刊最多的藏书家之一。但是,巴金并无要做一个藏书家的雄心,对书的热爱是他买书的巨大动力,这些书为他的写作、翻译和出版提供了重要参考。



读书的时候,我在想什么?

蒲素平

显然,我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没有任何人要求或强迫我读书,甚至我的工作也不需要我读太多的书,但我仍然乐此不疲地用大把时间来读书或写作。小时候就喜欢读书,可偏偏没有书读,就四处找,凡见到有铅字的纸张就必拿起来颠三倒四地看。后来工作了,却是电力野外施工,常年住在乡村里,能见到的文字除了几本专业书就是施工图纸上的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缺什么喜欢什么,看不到书就更喜欢读书,那时读书也没有方向就是乱读一气,正是从那时的乱读中慢慢开始了写作,读的书渐渐有了方向,或者说把没有方向的书读出了方向,曾把许多工科专业的书读出了文学的味道,曾从工程力学的书中生生出生活临界状态的文学表达方式,从电子书中读出文学表达的生成和变化方式。在这种离奇的自我想象中,得到一种漫无目的的想象快乐,于是我

的诗歌创作便随之开始。当我充满情感、诡异的工业诗歌一出手,在诗坛便得到众人惊异的目光和一些肯定。在孤独寂寞的工地上,慢慢学会享受读书带来的快乐,这时候的读书,更多是一种内心与外界环境达成和谐交流的过程,并以此驱除内心的荒芜。工地上,常常在劳动之余,拿一本书慢慢读,任阳光在身上暖暖地照着,风轻轻地吹着,风轻轻地吹着,突然飞来一两只鸟,在阳光下跳跃着。偌大的天地间,无垠的旷野上,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了。读一会书,发一会愣,想一些漫无边际的事。遇到雨、雪、大风天,不能施工的日子,便窝在山村的农家里,安静地读书,这份安静与周边的环境形成巨大的融合性,仿佛进入农耕时期,风是风,雨是雨,雪是雪,仿佛就应该用读书来打开生活的另一种方式。

自从写作之后,为了使自己能具

有越过繁杂的事物表面,直接进入事物核心的能力,一段时间里开始读哲学书,甚至为了强化记忆,跟上艰涩、深邃的词语指向,一句一句读过之后,整本抄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等书籍。这时候的读书,更像一个爬山者,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一步一步向上爬。因为有目标而无实用的目的,所以读起来,倒不觉得沉闷和无趣。说起设置目标进行读书,我一直有个小小心病,因为不是大学文科科班出身,自我感觉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所欠缺,前两年下决心补一补。于是用了一年半的时间重新梳理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从各个历史节点找出代表性人物,以人物为原点做放射式阅读。一边读,一边做笔记,这样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一直读到民国梁启超、王国维。通过纵横、交叉、比对、融合等方式的阅读,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脉络有了相对自我的认识,并

顺便捎带着写了一本近20万字的《文化的背影》文化散文集,有时想想,这也是一件好玩的事。

这一两年,因为半道出家写评论文章,又开始阅读一些文艺理论和评论的书籍。每每抱起大部头理论书籍,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死读到底,常常有选择地看观点,先把一本砖头厚的理论书籍,迅速看薄,抽出作者的核心观点,然后由观点出发形成几条阅读的线,向前延展阅读。这种读法说不上好或不好,个人爱好而已。读书这东西,读得越多,就越喜欢一些好玩的书,一些有趣味的书,如前段时间读阿来的《成都物候记》就很有意思。近日在读大解的《傻子寓言》《别笑,我是认真的》,突然感觉这样的书,应该推荐给天下的男女老少去读,这样的书别有情趣,好读又异想天开,你会发现生活原来是如此的美妙、荒诞又好玩。

在茨威格的记忆中捕捉群星的光芒

石涯蔚

1881年11月28日,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出生在维也纳。多年以后,学者们谈起《昨日的世界》时,眼里依旧会放出异样的光芒。他们惊叹于茨威格炫目多彩的艺术生活,绰号多姿的行走方式,激动动荡的一生。不过提到这本自传,总会皱起眉头:说是自传,连茨威格的日常起居都没提到;说是史书,却从头到尾都是个人记忆。茨威格毫不讳言《昨日的世界》是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它在纽约一个荒凉的小镇写成,它缺乏重现日时光的可靠材料,它不过多地叙述个人的私密花园,它要描述的是一个“节点”,一种由外力产生的不同的人生状态,和变异中的时代精神。

在《昨日的世界》中,茨威格盛赞比利时诗人爱弥尔·维尔哈伦(Emile Verhaeren)为理想人格的代表——秉性中有诗意的光芒,有低调而稳健的气质,淡泊金钱和荣誉,偏安一隅默默劳作。茨威格没有注意到,他高举的维尔哈伦的人格标签,正是犹太民族长久以来的性情。茨威格继承了犹太人的敏锐、谨慎、洞见,保持了犹太中产阶层的教养、才华,从父辈那里举起低调、节制的作风,拒绝奢华和张扬。14岁就把荣光印在了维也纳最权威的《新自由报》上,19岁借《银弦集》收拢人心。在欧洲艺术中心维也纳,这位绅士驰骋才华,恣意放纵文学与艺术细胞,可谓春风得意。像大哲人康德一辈子在那棵小菩提树下进行哲学思考,茨威格从青少年时代就决定投身文学艺术。他笑言,自己获取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头衔,只是奉犹太先祖之命和父母之言,内心深处早已种下文学与艺术的种子。只是和康德不同的是,茨威格没有把自己的足迹,圈在格尼堡方圆40公里范围内,更不会让“伟大历险只在头脑中发生”。

茨威格在欧美各国的游历,给他增添了除见识以外的生命体验、艺术灵感和精神感受。如果没有不断的陌生体验、感受、互动的撞击,直击人心的情感经验与思绪,很难会力透纸背地从茨威格的文字中传达出

来。更重要的是,愉快的畅游,给茨威格提供了与各路名人谈笑风生的机会。茨威格随身携带诗和灵魂,也携带过日记。茨威格不记录与名家相识相知的过程,更用丹青妙笔把这些人的神态、心理,举止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献出一幅幅生动的人物水墨画。《昨日的世界》里,安宁、淡泊的法国诗人里尔克,似乎更愿意和瓦兹华斯为友,而与卢梭的天真、热烈有别。《犹太国》的作者赫茨尔,身上悲剧性的气质,显得尤为为强烈。瘦长、发黄、骨宽,即使“肺坏了,可是依然活着”的俄国作家高尔基,像海燕般在暴风雨中毅然飞翔的强大生命意志,不禁让人肃然起敬。那对生活中的好友、意见中的冤家萧伯纳和H·G·韦尔斯,当着青涩的茨威格的面“吵架”的情景,让人怀疑是不是当了大文豪就可以返老还童。还有罗曼·罗兰、乔伊斯、克罗齐、罗丹等,都在《昨日的世界》展翅惊鸿,竞相高下。难怪茨威格毫不客气地说,“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著名画家、演员、学者,谁没有到过我们家呀。”当然,茨威格的大手笔还是在《世界建筑师》和《人类群星闪耀时》这两个人物系列中。他的精雕细琢,是为了让特殊的灵魂永葆昨天的色彩。

海德格尔的诗意栖居强调天地人神的共生共创共存,茨威格想用一种精简的方式把诗意浓缩在纸片上,放置抽屉之中。像20世纪初德国杰出的哲学家阿多诺谈起音乐时的眉飞色舞,茨威格对他一生收藏的名人手稿反复念叨,直到生命谢幕前,仍对一些遗散在世界各地的手迹念念不忘。这些手稿的价值无法估量,就像茨威格的精神对后世的影响无法估量一样。茨威格自称,在手稿收藏领域,他是第一权威和真正的鉴赏专家,不但一眼能辨别真伪,在估价上也比大多数专业人士有经验。这些手稿的主人不乏茨威格一生敬仰的歌德、罗曼·罗兰、巴尔扎克,也不乏莫扎特、巴赫、贝多芬等音乐大师,罗曼·罗兰、里尔克、克洛岱尔、弗洛伊德、高尔基甚至亲自将《约翰·

克利斯朵夫》《旗手克利斯朵夫·里尔克的爱和死亡之歌》《给圣母的受孕告知》、论文等手稿赠予茨威格。茨威格收藏手稿和那些为钱和利的收藏家不同,他收藏手稿是为了完成艺术精华的提纯。茨威格说,他凝望那些经过反复推敲或冥思苦想过的原稿,即使“几道铅笔线删去的地方”,也能感受到艺术家们“才气横溢的创作热情”和灵性迸发的神秘瞬间。茨威格在用一种极致,甚至极端的方式,去保存智力的精华与创作的灵感。

回望昨日的岁月,茨威格失落地点言,让他与20世纪的维也纳剧院、珍贵的手稿、柏林的自由分离的,只有炮火。茨威格把罗曼·罗兰看作欧洲良知,在罗曼·罗兰身上有“一种人性的、道义上的优势,一种不带骄傲情绪的、内心的自由——一个坚强的人所拥有的不言而喻的自由”。然而,战争将多年来建立的自由和良知毁于一旦,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狂热像洪水般极度泛滥,野蛮、暴力、专制、鄙夷像野草一样疯狂生长,人们活在恐惧之中,每个人都担心晚上一觉之后,再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茨威格亲眼目睹西方文明和崇高理性的坠落,看到道德、人性和独立思想像秋风中的树叶一样可悲地飘零。让茨威格痛心的是,面对野蛮和暴力,欧洲知识分子不但不加以拒斥,反而为战争摇旗呐喊——众多作家、学者、医生、教徒在战火上浇油、欢呼,那些被认为是坚定的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夜间都成了狂热的爱国者,并且又从爱国主义者成为贪得无厌的兼并主义者”。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一直追问,知识分子到底怎么了?被称为人类良知的这批人究竟出了什么毛病?为什么人性和道义丧失得如此迅速?茨威格不断描绘那个青少年时期穷困落魄、默默无闻的希特勒,描绘那些没有权力、甘愿沉潜于本职专业的知识分子,不敢相信当年住在他家对面的小男孩和受过文化熏陶的知识人,日后会

成为刽子手和帮凶。茨威格反复运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解释被摧残的现实:战争是人类力量过剩和乐观主义过剩的结果,被长期压制的潜意识助长了极端的暴力。茨威格不知道的是,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汉娜·阿伦特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尤其是被边缘化的群体,作为极权主义起源的基础。

在《昨日的世界》这本非典型自传中,茨威格时常以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所描述的那类介入性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身影出现:茨威格完美地描绘了自由主义鼎盛时期的维也纳,复现了19世纪自由、道德、从容的欧洲,接着以巨大的勇气呈现理性和自由的陨落,然后大声疾呼建立精神统一的大欧洲,并将它纳入世界公民的版图——茨威格反复强调自己不仅是欧洲人,也是世界公民——那类具有独立思考、理性智慧、自由精神、大度包容气质的世界公民。茨威格不仅反复呼唤世界公民,而且以艺术的方式拒绝任何暴力和战争,他高举独立、自由、和平旗帜,几乎孑然一身投入抵抗活动之中。他创作反战诗剧《耶利米》,将《圣经·旧约》中这位先知耶利米的预言——穷兵黩武的以色列终将失败,移植到当下军国主义德国,上演了借古讽今的戏法。《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虽然讲述暗恋的故事,但其中加入了肉身赎卖、悲恋等元素,呈现出情爱背后的现实指涉力——对战后人生困境的思考。只是,在写《昨日的世界》的时候茨威格已知道,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而带有普遍人性气质的世界公民,只能由后人不带悲剧性地完成。

茨威格,这位喜欢狗、咖啡、雪茄、音乐和手稿的作家,用他的理性与才华,以跨世纪的眼光打量世界、社会和人类命运,呼唤一种古典的道义和人性。

他不逢时,在战火的延烧与种族的敌对下东奔西窜;他正当其时,以前所未有的血泪情感和精致技艺,唱出震撼人心的道义离歌。

纪念茨威格!

书单

你的冬天该读更多的书

没时间看书的人无处不在。注意,不是没时间,是没时间看书。没时间,是忙到昏头昏脑,夜深时,还要拿起书眠三行的人。没时间看书,是完全不花时间去看书,只是偶尔想一想看书这件事,罢了。

其实,忙碌了一天,最放松的,就是夜晚至在一角看书。看着看着,笑了,落泪了,心就抽离了,空掉了,也休息到,也品味到。

因为,书里总有一些人,可以把你从生活的泥淖中扯出来。

众声喧哗的年代,那么多人都在喊着走向成功。而阅读,会尽量压低你的声音,提示你看到宁静拥有的光芒。

今年最后一个月,你还能读三本书。

本周书单有陈来的最新思想随笔集《守望传统的价值》,看这些有思想温度的文章,可以窥见传统文化的传承,传统文化复兴运动的率先发动者、学术的走向、争论的焦点、研究的气魄等;有纪念马克斯·韦伯的《科学作为天职》,阐释韦伯当年的思考,也借经典审视了我们的现实处境;还有日本导演是枝裕和的《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用68幅剧照和分镜头回顾自己30年的创作生涯,也坦承自己对电影依然心怀迷茫和踌躇。



《守望传统的价值》

从1994年到2018年间,在长达20余年的传统文化思索、阐释文字中,陈来以智者的纯粹之心剖析中国的社会转型、文化结构的调整、学界思维的定势,撷取经典片段呈现给读者,不仅揭示了20余年传统文化的发展特点,也梳理了传统文化复兴的线索,并对传统文化研究做了有创造性的阐发,字里行间彰显反思和批判的力量,沉静平实,又总能言必有中。



《科学作为天职》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轻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与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为了纪念100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



《拍电影时我在想的事》

是枝裕和原本并不愿意谈论自己的电影创作,因为他认识到自己开始有创作意识的时候,探究“电视为何物”、大胆制作各种电视类型的时代已落下帷幕。而且他也意识到,自己讲述的电影语言,是“带着电视口音的方言”,在语法上不够规范,因此对电影始终怀有一定的顾虑。所以是枝裕和提到,在这本书里,自己不是作为电影导演,而是以电视导演的身份,从内部视角出发讲述与现今的电影创作以及电影节相关的事情。